瞎子的眼光

我今年有一段新的經歷——應邀去上海的東方電視台，在其戲曲欄目當中主講一年的京劇。因此每當涉及到一些既有畫面、同時內容上也很重要的場景，導演就自己搞起「音配像」。譬如，一次我講蓋叫天在杭州金沙港茶館喝茶，導演就選用了《沙家濱》「春來」茶館的景片，臨時貼了個小茶招——「秋去」（茶亭）。蓋進茶館坐下，就進來一個瞎子討飯。這時，坐在蓋身後的一個老者發話：「瞎子，你看得見我麼？」瞎子聽了心裡有氣：「我有殘疾，你這不是拿我開心麼？」這當然是潛台詞，瞎子停頓片刻，嘴上卻祇能回答：「我看不見呀，老爺！」對方仍問：「你使勁去看呀！」「我祇看見一片黑……」「你黑都能看見，難道白——你反倒看不見了麼？」

寫這番對話的目的是爲了襯托蓋叫天。他在無意中聽到這番談話之後，心中忽然頓悟——眼睛瞎了，心卻不該瞎。祇要用心，就不僅應該能辨別黑白，還應該區分美醜和善惡……當然，這些都是「後話」。在前邊拍這個瞎子時，結果這段「墊戲」也大有學問。不知您是否見過生活中的瞎子？每當他們翻開上眼皮，露出那片大大的眼白時，您準會覺得不舒服。但我們「音配像」中的這個瞎子，當他說「我看不見呀，老爺」的時候，內心的苦楚和悲哀，都通過那無助的眼神，表達得十分醒目。他就是上海崑劇團的著名演員張銘榮，一向以武戲著稱，我這次是第一次看他的「文戲」。拍攝完畢，我悄悄問他：「您這瞎子還有眼光？」「當然有。我們崑曲裡有瞎子角色，老師當初教我們時，就說『瞎子戲』有『東西』，譬如瞎子也能夠有『眼神』……後來，我們演瞎子就要費很大力氣去翻眼皮，去練習各種瞎子特有的動作去配合……」導演在表現這段戲時，也巧妙利用了他特殊的眼神，在表達潛台詞時運用了一種，在回答老者時則運用了另一種……這瞎子的表演眞應該得到喝彩，甚至導演分鏡頭的處理，似乎也應該獲獎。

就這樣，我們拍攝自己的「音配像」成了習慣。在每週一次的節目中，都要包含三段「音配像」，叫「小品」也成，叫「話劇片段」也成。這三個「音配像」之前是畫外音，之後是我的點評。每來上這麼三回，一共三十分鐘的節目也就結束。漸漸的，我寫電視腳本從思路上說，就與尋常寫文章不同了。寫文章要從內容出發——從頭到尾，從前向後——要想好文章的起承轉合再動筆。寫腳本呢，則得先想「音配像」的畫面，得看這些畫面是否有「意思」。如果有了，再前後伸張——加一些文字，於是這一期的節目也就「有了」。電視需要的就是這些能夠讓觀衆興奮的「點」，祇要有了這些「點」，再加些能伸張出去的話——也就成了。在電視觀衆那裡，要的祇是興奮，不太注意邏輯或推理。久而久之，我寫電視腳本也慢慢慣了。有時再寫文章，反而覺得手生。記得前些年，有些作家「下海」寫起了電視劇，常說一旦寫得太多，就會把自己的手寫「臭」，不知道可就是這個意思？

再有，我們自己搞「音配像」也有難言之隱，因爲現在特別強調版權。中央台播放的「音配像」是別人搞的，使用別人的總要支付版稅，而支付多少才算合適？這實在不好說，而且主動權往往不在自己手裡。再說，我們搞的節目有自己的邏輯（儘管在寫法上不需要太注重邏輯），而目前統一製作的京劇「音配像」在客觀上是表達一種結果——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京劇諸多劇目所反映出來的表演最高水準，而我們節目所要完成的，則是京劇各個時期發展、前進的過程。人家表達結果，我們是寫過程——這就是我們之間最大的不同。既然這樣，如果我們還要一再使用人家的東西，豈不是很糊塗麼？目前，國家祇做了京劇上的「音配像」，其實各個省區也應該做本省地方戲的「音配像」。隨著戲曲的推陳出新，這種情況是遲早要出現的。

伯特利神學院

每次經過九龍城嘉林邊道，最吸引我目光的是一幢帶有裝飾藝術風格的建築物。其正面牆壁寫上「伯特利神學院」六個字，最初我以爲它與薄扶林「伯大尼修院」的名稱源自《聖經》同一地方，後來知道兩者有別。另外，伯特利神學院是基督新教的機構，而伯大尼修院則由天主教傳教士建立。

伯特利教會於一九二〇年在上海設立，創辦人是祖籍湖北的石美玉醫生和出生美國的胡遵理教士。他們在沒有外國教會資助之下，憑二人努力，先後開辦醫院、禮拜堂、學校、神學院和孤兒院。上海淪陷後翌年（即一九三八年），神學院和孤兒院遷到香港，覓得嘉林邊道的房屋作爲院址。

日治期間，日軍以「美敵」產業爲由佔用伯特利神學院。戰後院方申請取回物業復課，並增購毗鄰的房屋開辦平民識字班、小學和中學，透過教育傳播福音。五、六十年代，香港資源匱乏，兒童失學問題嚴重，伯特利教會向政府提議利用徙置大廈天台作爲校舍，結果獲得批准，使當時的貧窮兒童也有機會接受教育。樓高三層的伯特利神學院已被列爲二級歷史建築，院內仍保持三十年代的樣貌，門窗、樓梯、階磚、壁爐和走廊的燈座，皆古色古香。該院的上層供學生寄宿之用，現今地方已不敷應用，教會決定向城規會申請擴建。

富有三十年代建築風格的伯特利神學院

自圓其說

學子也問：老師退休後，可有什麼心願要圓？

人生如缺了的明月，該有圓的時候，他們是如此的相信。我祇能說。明月可圓，一些人的一生，卻未必眞的有圓的日子，誰不想眞正可「圓寂」？

之所以，退休了，就給你一些時間，好好的「自圓」其一生，修修補補，把缺了一些地方，補遺一下就是了？想不到昔日在大學上哲學課，老教授教我考試，出了幾題有關宋明儒學的論述題，叫我任作二題，我問如何任作？他說，任是題目任選，作是論述，但要自圓其說，不必跟隨他的觀點。

然而我還是跟了他的觀點，不敢「作」將起來。今天回想，人生就是「任作」，但我還是跟大多數人的觀點：題目我是選了（在有限的選擇），但作呢？不敢胡作妄爲，是怕最後不能「自圓其說」。

偶爾跟好朋友談到大半生怎樣自圓其說，我「自圓」不到時，想聽聽他怎樣爲我「自圓」。某年某事，今天如何Justify？他說：總可以的，退休後仔細想想吧。生命中有太多的不可解說，太多的自相矛盾，實在不容易、甚至不可能自圓其說啊。退休的歲月，該好好清理腦中的門戶，打掃一個乾乾淨淨才是，這也就是我說過：退休是一個給自己執正一生的最後機會，吾等齊齊執正乎？

盜賊如毛

爛銅爛鐵，從前沒人看得上眼。如今商品有價，不但金銀價飛漲，連普通金屬也人人看重，價值水漲船高。

街邊坑渠蓋，已是賊人覬覦的對象。日前香港仔華富商場街市發現慣匪，於清晨時分，用手推車將幾個沉重鐵渠蓋施施然運走。對他們來說，這些值錢東西放在公衆當眼處，不偷白不偷。台灣的竊盜更厲害，路邊的鐵絲網，電纜線，金屬電線桿，電纜箱，甚至監視器，幾乎無所不偷。不要說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了，連公用設施也夠膽偷，這是個什麼世界？

不說不知道，美國的竊盜，也是猖狂之極。認識幾位商家，都有同樣經歷。他們店舖外通常有銅水龍頭，方便取水。此法一向相安無事。近幾年，這些銅頭連水管，往往半夜被鋸斷偷掉，聞說每個銅頭黑市價已漲到一百美元，一個自助餐廳門外設有四五個銅頭，對賊人來說，是一筆值得冒險下手的不義之財。

一位公司老闆忽然從屋頂摔下折斷腿，爲啥？就是因有天上班發現高處有水滴下來，艷陽天，何來天雨？於是拿把梯子爬上去檢查。原來他怕水管銅頭被偷，將之裝設在高處，還是被賊人爬上去鋸斷，自來水流下來。害他賠上一條腿。生活艱難，君子之國變得盜賊如毛。我們都失去一向的安然。這位老華僑向來以移民美國爲傲，如今對治安的惡劣倖倖然，摸著那條斷腿一個勁搖頭說：今時不同往日。惟一的好處是：既然垃圾有價，家中報廢的傢具或大型電器用品如洗衣機雪櫃之類，以前規定不准棄置於家門口，還得僱人來清理，如今祇要一擺出家門，在市政人員發現之前，馬上就不見了。

過關人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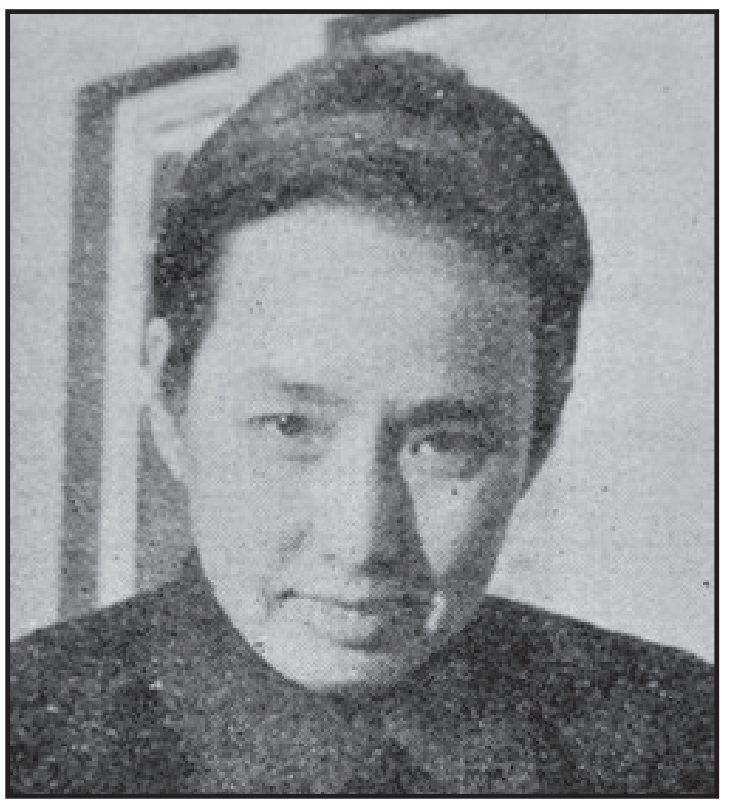
復活節假期，內地不放假。每年所供職的大學中心都會趁此檔期，安排「普通話教中文」課程的學員到深圳、上海和台灣去觀摩中小學的語文教學。

學員都是香港中小學的普通話、中文教師，他們大多很少甚至是第一次上深圳。主持活動的中心少不了要詳細指導他們過境時的種種細項。特別提醒說那天是公衆假期，過關人多，一定要提前出發去趕聽早上九時半的第一節課。

那天我六點起床，七點出門，也該是不晚的了。到了落馬洲口岸，還是大吃了一驚。眞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才八點多一點，過關人潮早是黑壓壓一大片。驀然想起，今天不但是公衆假期，還是清明掃墓的高峰月份，所以不論哪個口岸，都必然是大批扶老攜幼的家庭。落馬洲比平日的過關者多出若干，每一條人龍都長達近乎百米。就連我這種過關常客都有點震怵，就不要提少過關或者是第一次過關的人了（事後有學員表示，她是頭一遭到深圳去）。

現在兩邊都有自動查驗證件的裝置，多少加快了速度。但那畢竟是機器，不靈驗時便成了「激氣」。很多人把手指放上驗指紋區時，都總有偏差，如是來回幾次，最後要等關員幫忙，比人手檢驗更費時失事。更難堪的是，一旦出現阻礙，後面排隊者就會出現許多「指導」者、埋怨聲甚至謾罵聲，所以不少人寧可去排人手查驗那一條更長的隊伍。

紀念陳波兒逝世七十週年



陳波兒是個閃光的名字，她的藝術經歷和實踐，永載中國電影戲劇史冊。她是中國人民電影事業最早的組織者、優秀的人民藝術家、卓越電影戲劇表演藝術家。

陳波兒，廣東潮安人，一九一〇年出生。她早年曾在汕頭讀書，喜愛戲劇，後到上海就學於格致學院、公學院、藝術大學。一九二九年她參加以魯迅爲首的保障人權自由大同盟，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領導的上海藝術劇社，從此開始左翼戲劇活動。

早期影劇生活

作爲電影演員，陳波兒主演的影片數量並不多，但由於《桃李劫》、《生死同心》這兩部影片的巨大成功，受到了進步輿論的廣泛讚揚，贏得了廣大觀衆特別是青年觀衆的追捧，使她成爲上世紀三十年代走紅的電影演員之一。此外，陳波兒還主演過《樑上君子》、《愛與死的角逐》、《炭坑夫》、《西線無戰事》、《街頭人》等話劇作品，轟動上海劇壇。

參與營救「七君子」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國民黨政府在上海逮捕了沈鈞儒等「七君子」，關押於蘇州法院看守所。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陳波兒和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人，共同簽名發起救國入獄運動。七月五日清晨，陳波兒又與宋慶齡、胡愈之等懷著憤怒的心情，帶著簡單的行李，乘車前往蘇州準備入獄。他們到蘇州後，直奔法院看守所。電影名星陳波兒爲救國入獄的消息，在蘇州不脛而走，大批影迷和青年學生聞訊趕來，對她勇敢地跟隨宋慶齡一起進行的抗日愛國鬥爭的大無畏精神，表示極大的欽佩和支持。

慰問前線將士

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支持下，陳波兒率領上海婦女兒童慰勞團，攜帶大批慰問品，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前往綏遠前線慰問抗日將士。二十一日，他們一抵歸綏即至傷兵醫院，除分發慰問品外，陳波兒還高唱救亡歌曲，在場的人均痛哭失聲！二十二日，在歸綏公共會堂舉行了日夜兩場慰問演出，陳波兒主演《放下你的鞭子》、《張家店》、《走私》等。陳波兒是第一個把在上海等地被國民黨當局禁演的國防戲劇，勇敢地送到國防前線去演出的藝術家。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後，陳波兒滿腔熱情參加了上海影劇界聯合演出的三幕話劇《保衛盧溝橋》，大大地激勵了上海人民的抗戰意志。隨後她還在武漢參加了影片《八百壯士》的拍攝。

在延安

一九三八年冬，陳波兒由重慶到達延安，這是她第一次來到革命聖地，一切都感到神奇，耳目一新。不久，她率「戰區婦女兒童考察團」離延安，渡黃河入晉察冀邊區，又經山西、河北、河南、陝西，深入根據地，開展抗日民主戲劇演出活動。

一九四〇年秋，陳波兒回到延安後，立即獲得了進入延安馬列學院和中央黨校學習的機會。她利用課餘時間，參加戲劇活動，先後導演了話劇《新木馬記》、《俄羅斯人》、《前線》、《同志，你走錯了路》和《馬門教授》等。特別是在《同志，你走錯了路》的導演上，她採取了走群衆路線，廣泛聽取工農群衆的意見，因而在手法上打破洋教條，在舞台上衝破了舊形式，使舞台充滿活力，觀衆喜聞樂見。

籌備根據地電影廠

一九四六年初，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延安電影製片廠，作爲開展西北地區電影工作的基地，並責成陳波兒負責籌備。她從組織隊伍、準備腳本，到購置器材，均親力而爲；爲創作拍攝影片《邊區勞動英雄》勞碌、辛勤筆耕，完成了解放區第一個電影劇本，並投入緊張製作工作。一九四六年七月，她又到東北組織創建東北電影製片廠。她親自領導新聞片組，向東北前線、後方、工廠、農村、礦山、學校、內蒙古草原派出二十多個新聞攝影隊，拍攝、編輯了十七輯以紀錄片爲主的電影特輯《民主東北》，忠實地記錄了東北人民解放軍和東北解放區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中的重大事件，緊密地配合了解放戰爭中黨的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在中國電影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篇章。同時她還積極組織其他片種，如故事片、美術片、科教片、譯製片等。

從北平到北京

一九四九年七月，陳波兒到北平出席第一屆文代會，與來自解放區、國統區和海外歸來的藝術家一起，憧憬建設新中國的美好遠景。九月二十一日，她出席了在北平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討論和決策。十月一日下午，她參加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開國大典，親耳聆聽了毛澤東主席宣佈建國。從北平到北京，她經歷了祖國變遷和她人生的變遷。

新中國成立後，陳波兒在中央電影局做領導工作，最早的一批人民大衆熱愛的電影，如《鋼鐵戰士》、《八女投江》、《橋》、《趙一曼》等無一不是在她指導下完成的。她富有卓識的遠見，關心人民電影事業的未來，爲培養新一代電影事業的人才，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她倡議創辦中央電影學校（現北京電影學院前身），親自製定教學方針，配備工作幹部，並抱病到表演班上課，關心同學們的學習、進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陳波兒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召開的一次主要創作人員座談會上，心臟病突發，被送進醫院，終因搶救無效，逝世時才四十四歲。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北京首都電影院舉行了陳波兒追悼會。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田漢泣讀了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軍委會政治部、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祭文：稱她是「有著卓越才能的電影藝術家……」，胡喬木、週揚都在會上講了話，鄧穎超宣讀《悼念陳波兒同志》的悼詞。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市文化局、市婦聯和市文聯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舉行陳波兒同志追悼會，於伶宣讀祭文，主祭人夏衍在悼詞中指出：「革命不是一條平垣的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走這條路，更容易遭受到挫折、失敗，或者迷失方向。在這一點上，陳波兒同志的那種永遠不怕困難，永遠堅持正確方向的精神，是深深值得大家學習的。」在長春、瀋陽、武漢、重慶和西安等地，各電影製片廠、各文化部門、文藝界、戲劇界、電影界，也分別舉行了不同形式的悼念活動。

一九九四年，廣州雕塑院一級美術師唐大禧創作的「陳波兒雕像」，在潮州市西湖公園內落成揭幕。

陳波兒離開我們已經七十年，她輝煌的表演藝術形象和對工作孜孜以求的態度，將永遠銘記在億萬觀衆的心中。

破破官本位

去年，一位老華僑從首爾來北京看我，閒談中他問，國家主席出訪，怎麼看不到外長陪同？我說，不會吧，每次都有外長陪同。他說，他很關心中國領導人出訪，特別是國家主席出訪，他每次細看《人民日報》，幾乎每一條消息都不落掉，但是看不到外長陪同的報道。我將信將疑，回來後就細查了報紙，果然他說的一點不假。後來我也注意到，國家主席出訪，不管去哪個國家，祇在出訪離開北京的消息中，報道一下全體陪同人員，在外面的幾天活動，儘管報道很多，陪同人員祇點名到國務委員，其他人員一概不提。在回來的專機上，如果外長吹風介紹訪問成果，會發一條消息，提到外長的名字。但整個訪問過程，外長是否陪同，從報道中確實看不出。這就牽涉到新聞報道該如何掌握的問題。 由此我想起一件往事。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一次週總理會見朝鮮外賓之後，問每個工作人員的名字，包括翻譯、速記在內，我們有點奇怪，週總理可能看出來，於是對我們說：「發消息要把你們的名字都寫上，沒有你們，我怎麼可能會見外賓？」他說完，還特別對記者做了交代。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的週總理會見外賓的消息中，果然不僅有部長、副部長的名字，也有了包括翻譯、速記等工作人員的名字。從那以後相當一段時間，週總理會見外賓，每次工作人員的名字都見諸新聞稿中。記得那之後，中國外長出訪朝鮮，消息稿中也有工作人員的名字。 寫到這裡，我想，現在的新聞之所以如此，是不是因爲記者，更主要的是他們的上司官本位思想太嚴重了。我倒不是說，現在的新聞報道一定要按當年週總理要求的那樣，連工作人員的名字都寫在新聞稿中，因爲現在的情況與四十年前已經大大不同，外國領導人來訪絡繹不絕，我國領導人會見外賓的消息充斥每天《人民日報》等報紙的版面，像當年那樣做實際已不可能。但是，我也想強調，新聞報道千萬不要受官本位思想的束縛，更不能以官位的高低來決定新聞的取捨，這一原則恐怕與當年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遺憾的是，除新聞報道外，社會上官本位現象太嚴重了。大學校長、企業老闆都有副部級和非副部級之分，參加活動的座位順序也是按出席人員官位的高低安排先後，甚至新設一個機構，其成員也分三六九等，部長級爲高級顧問，副部級爲顧問，司局級爲理事，等等不一而足。官本位現象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值得深思，外長陪同國家主席出訪，新聞報道中理應提到，因爲是外交活動，他又是國家代表，與其他部長有所不同，當然我決沒有貶低其他部長的意思，老華僑的反應也說明了這個問題。

紐約的櫻花節

布魯克林植物園每年櫻花節的活動，聞名全美，也是紐約人的最愛。四月底的週末，天公作美，陽光亮麗，氣溫宜人。我們上午十一點多到達，植物園門口排了長長的隊伍。我們心情很放鬆，知道今天有各種精彩表演，但是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觀賞櫻花。二十多分鐘後，我們已經走在植物園裡，不但花草樹木好看，人也好看。許多女士盛裝前來，有幾位東方年輕女子穿了流行的日本娃娃裝，我以爲是日本人，後來聽到她們講話，原來是同胞。搭訕後得知，她們是留學生。

時間眞是趕對了，兩百株櫻花正開到最盛，遠望如一片片粉紅的彩雲，走進樹叢像是踏入夢幻。我想起愛麗絲從洞裡往下跌的感覺，這也是我們即將展開奇遇的序幕吧？站在群樹之中，妹妹仰著頭轉著看個不停。我看妹妹十足獃頭鵝的樣子，妹妹看我當也如是。我們在繁花下徘徊，從這棵樹看到那棵樹，無從比較，株株美麗。

草坪上搭起的大帳篷，傳來音樂聲，我們循聲而去。裡面坐滿了人，在好心人挪移出的空隙，我們席地而坐。舞台上演出傳統的日本舞蹈，輕曼優雅。接下去是擊鼓表演，剛勁矯健，充滿了力度的美，從開演到結束掌聲不絕。我們休息夠了後，又回到櫻花樹林織成的夢幻中，直待到夕陽西下。